

Πολιτεία

王有所成

习读柏拉图札记

刘小枫 著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王有所成

习读柏拉图札记

刘小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刘小枫 著

出品人：王 蕾

总编辑：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 頔

封扉设计：周伟伟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20mm×1280mm 1/32

印张：8 字数：126,000 插页：2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ISBN：978-7-208-13280-1 / B·11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 刘小枫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280-1

I. ①王… II. ①刘…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B502.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0323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弁 言 1

苏格拉底与“众人的权力” 3

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 31

民主政制中的自由爱欲立法 65

内敛的哲学与外显的诗 123

王有所成 179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225

弁 言

1988年初冬，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此期间结识了该校宗教学系的资深教授沈宣仁先生。这位学识渊博的和蔼长者对我非常关心，推荐我去他读过书的大学深造，还为我找到奖学金。沈宣仁先生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谁若能去大名鼎鼎的芝大读博士，都会求之不得。可惜我当时迷恋欧洲，最终选择去了巴塞尔。

我念完博士学位到香港，没想到与沈先生成了同事，交往机会多起来，遗憾的是他没过几年就退休了。沈先生喜欢柏拉图，他曾说退休后打算翻译柏拉图。可惜他身体不好，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哪怕一篇柏拉图短篇对话的翻译。

沈先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进的芝大，因此我曾想，他喜欢柏拉图是否曾受过施特劳斯的熏陶。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听过施特劳斯讲课，他说听过——这顿时让我心生羡慕。我问感觉如何，沈先生用手指头指着自己的脑筋转了两圈说：他脑子非常清晰……不过，经细问我才知道，沈先生在芝大时仅听过施特劳斯几次公开讲座，并没有上过施特劳

斯开设的课程，也不知道芝大有个施特劳斯的学生群体，他毕竟是宗教学系的学生。

记叙这段旧事是因为我感慨自己生得晚了些，没能有机会亲自听到施特劳斯这位当代的苏格拉底讲课——虽然如今有讲课录音可听，毕竟与现场不同。熊伟教授当年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未必时间很长，因为那时日本入侵且蹂躏中国，他一心想赶紧回国抗日救国。但我听他回忆当年上课的情形时，仍然见他两眼充溢着幸福的神色。沈先生一直让我羡慕，因为他毕竟亲自听过施特劳斯的公开讲座，而且不止一次。

这本小书收入笔者晚近几年写的五篇习读柏拉图的札记，算是在施特劳斯讲课录音的指引下阅读柏拉图的一点点心得。

另附一篇八年前写的涉及中国古学的旧文，以此表明，即便在阅读柏拉图时，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中国的学问。

刘小枫

乙未年4月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苏格拉底与“众人的权力”

——《克力同》44b5—47e4 发微



哲人苏格拉底之死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政治事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史事件。由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传世作品对这一事件的记叙，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历代思想者一直得面对的基本问题。然而，无论柏拉图还是色诺芬，都不是如今意义上的“史学家”。他们通过记叙苏格拉底之死来呈现属于哲人的基本问题，毕竟，仅仅陈述历史事件并不意味着理解事件。如果当今的史学家要重写苏格拉底之死，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攀比的不可可能是所谓史料，而仅仅是理解能力——苏格拉底之死考验的始终是后世之人对苏格拉底事件的理解能力。我们要对自己的理解能力有所认识，首先需要认识柏拉图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事件的理解所达到的精神高度。通过识读柏拉图在《克力同》中记叙的一段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本文力图探究我们与柏拉图在理解苏格拉底上的思想距离。

一、苏格拉底面对民主的“不义”

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制的公审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依据的是有人对他提出的两项指控：“不敬城邦神和败坏青年”¹。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起头，色诺芬用两章篇幅分别驳斥这两项指控；驳斥“不敬城邦神”指控的第一章很短，驳斥“败坏青年”指控的第二章篇幅多两倍。²色诺芬是这样结尾的：

与那人控告他〔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相反，他明明是在引导同伴们离弃低劣的欲望，劝勉他们欲求最美好、最伟大的德性，凭靠这种德性才能治国和齐家。
(卷一，2.64)

色诺芬反驳了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但没有否认苏格拉底劝勉青年追求治国齐家的德性——换言之，色诺芬没有否认苏格拉底搞政治。色诺芬承认，苏格拉底从事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苏格拉底并非要教育人民大众，而是仅仅教育少

1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1。
下引译文未作说明者，均为笔者所译。

2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义疏参见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高诺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数人——教育他们懂得何谓“王者”的德性。用现在的话说，苏格拉底显得是要做“帝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确在搞政治。他说，他觉得自己身属的城邦有如一匹高头大马，由于太大难免慵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于是忙碌奔波。但是，他始终只愿做一只私下的牛虻，从不肯置身公众之中，他知道民主的公众意味着什么（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0e1—31d1）。民主政制的法庭接受了有人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控罪，表明苏格拉底“私下”教育青年犯下的是政治罪。如今的我们以为，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不会有政治罪。柏拉图和色诺芬让我们看到，在民主的雅典仍然有政治罪，表明自由民主政制仍然有自己的政治敌人。在一个国家中，谁在教育青年始终是个政治问题。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那些人，自己同样在通过教育搞政治。民主政治家一旦看到城邦的优秀青年被苏格拉底吸引，甚至自己的学生也被苏格拉底吸引过去，他们除了指控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别无他法。

任何指控都有可能是诬告，控告变为定罪还需要法庭的裁定。苏格拉底被判刑，关键在于民主的法庭裁定对他的控罪成立，这等于裁定苏格拉底是民主政制的敌人。这个裁定显然会让后世所有把苏格拉底视为精神楷模的人坐卧不安——尤其让如今的我们寝食难安，因为，如果我们以一个公然有违

如今的普世价值的人为精神楷模，此人同样可能被判政治罪。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已经遭遇这样的不安。《回忆苏格拉底》开篇第一句是：

我常常感到惊讶，那些指控苏格拉底的人们究竟用了一些什么理由说服了雅典人，以至于据说他该当被城邦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不仅经过了合法程序，而且经过的是民主的合法程序——指控苏格拉底的那些人“说服了雅典人”。毕竟，苏格拉底虽然智性极高，却绝非与民隔绝，“相反，苏格拉底既十分贴近民人百姓，又热爱常人”（《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60）。换言之，雅典百姓对苏格拉底绝无成见。然而，人民“被说服”也有可能是“被蒙蔽”（比较《普罗塔戈拉》328e—329b）。因为，有民主政治就会有“公知”（*demegorikoi*），他们往往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48）。无论在民主的雅典还是如今，这样的情形绝不少见。经过民主的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未必就是正义的判决。至少，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民主法庭对他的判决是正义的。据色诺芬记叙，苏格拉底接到死刑判决时，他对弟子阿波罗多洛斯表明了自己对判决的态度。

一个名叫阿波罗多洛斯的当时在场，他热切地追随苏格拉底，不过此人心地单纯。他说：可是，苏格拉底，我觉得最难承受（或译：最让人生气）的是，我看到你将被不义地处死！据说，苏格拉底抚摸了一下他的头，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最亲爱的阿波罗多洛斯哦，你宁愿看到我被正义地处死，抑或被不义地处死？这时，苏格拉底笑了。（色诺芬：《苏格拉底针对陪审团的申辩》，28）¹

苏格拉底以超级幽默的言辞表明，这个民主的判决是不义的判决。然而，苏格拉底对这一判决一笑付之，坦然接受。为何苏格拉底坦然接受这一不义的判决，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问题并非在于，自由民主的雅典对政治犯也判处死刑，而如今的好些法学教科书都主张“废除死刑”。苏格拉底当然懂得，死刑不仅是城邦权力的体现，更是城邦正义的体现，城邦需要通过对危害共同体生活秩序的人判处死刑来实现城邦正义。废除死刑无异于废除了城邦正义的实施，因此，苏格拉底不会像如今的法学人士那样主张“废除死刑”，即便错判的死刑落到了自己头上。苏格拉底区分了“正

1 亦参吴永泉译《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申辩》，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前掲，页189—196。

义地处死抑或不义地处死”，并没有由于有“不义的”死刑判决而推论出所有死刑判决都不义。

苏格拉底为何坦然接受不义的判决之所以是个政治思想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为何如此面对民主的“不义”。苏格拉底心里清楚，指控他的不是雅典人民，而是少数民主派知识人，雅典的民主法庭不过对少数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作出了裁决——而且是在听取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作出的裁决。从而，苏格拉底面对的问题是，雅典人民是否有能力分辨少数民主派知识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与苏格拉底的申辩谁对谁错。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中说，自己始终不愿意面对人民。可是，民主派知识人的政治指控使得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人民”。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纪事作品中，有四篇直接涉及苏格拉底如何面对雅典人民。首先是著名的《高尔吉亚》，这篇作品记叙了苏格拉底上民主法庭之前与几位哲人私下讨论应该如何面对民主的审判。更为著名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我们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苏格拉底如何面对代表全体雅典人民的陪审团。篇幅不大的《克力同》和《欧蒂德谟》记叙的是苏格拉底与作为个体的雅典人民的关系。由于其中没有谈“相论”之类的哲学问题，这两篇作品在柏拉图研究中一向受到冷落，尤其是《欧蒂德谟》。然而，如果柏拉图作品的总体性质具有政治哲学的品质，那么，这四篇作品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

联就是理解柏拉图所有作品的基础之一。在题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自编文集中，施特劳斯从自己的大量柏拉图研究中仅仅选取了这四篇柏拉图作品，绝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放在一起识读。¹要搞清苏格拉底如何面对雅典人民，就得把这四篇作品连贯起来看，这需要一部专著的篇幅。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关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一段谈话来接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他认为对自己的民主判决是不义的？

二、克力同的劝告

苏格拉底一生中有许多朋友，克力同是他的一位特殊的朋友，甚至堪称“挚友”。克力同不是如今所谓的“知识人”，他热爱苏格拉底，喜欢听苏格拉底谈话，不是为了成为好智的哲人，更不是为了成为“公知或法官”，而是为了成为“美

1 参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应星译），见《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页54—92。施特劳斯因过早病逝未能完成关于《高尔吉亚》的文章。《欧蒂德谟》与《克力同》堪称姐妹篇，篇名看起来与克力同无关，实际上是“苏格拉底与克力同仅有的另一次交谈”（施特劳斯：“论《欧蒂德谟》”，陈建洪译，见上书，页93）。

好的人”，也就是对城邦和公民同胞有益的人（《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48）。在人生生涯中，克力同成了苏格拉底最信赖的人：苏格拉底临终前把自己的家事托付给克力同（《斐多》，116b1—3）。苏格拉底服刑饮鸩而死之后，是克力同替他合上了死不瞑目的双眼。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关系表明，好智的哲人与不好智的常人可以超乎寻常地亲密无间，这种亲密甚至超过智性的朋友。

然而，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亲密无间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思想上的差异。苏格拉底被判刑后，克力同觉得如果不救苏格拉底，就没法对自己交代。于是，他打算花钱救苏格拉底逃离判决。《克力同》记叙的是，苏格拉底服刑前一天，克力同一大早到监狱探视苏格拉底，劝说他越狱。克力同提出的理由是：作为自己“再也找不到的挚友”，他不能坐视苏格拉底被处死。何况，“多数人根本不会相信”，如果有机会逃命，苏格拉底会不愿意（44b5—c6）。克力同仅仅从个人情谊和“多数人〔众人〕”的看法出发劝告苏格拉底越狱，没有涉及苏格拉底遭受的判决究竟是正义还是不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没有对克力同的前一个理由提出异议，仅仅对后一个理由表示异议：不必在乎“多数人〔众人〕的意见”，而应该考虑“最出类拔萃者的意见”（44c7—9）。

苏格拉底与克力同在狱中的谈话有两大主题——前一个主

题是：听从“多数人〔众人〕的意见”还是听从“最出类拔萃者的意见”。后一个主题是：是否应该宁可遭受不义的法律判决也要守法。¹ 法庭依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不义的判决，克力同现在又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劝苏格拉底逃避判决，可见，何谓“多数人”依情境而定。“多数人”（*polloi*）也可译作“众人”，“最出类拔萃者”的译法则颇难拿捏，有人建议译作“贤能之士”、“出类拔萃之士”或“明智之人”。按柏拉图自己的用法，这个语词有两个基本含义：首先指见识卓越的人（《苏格拉底的申辩》，22a5），这种人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总是少数；其次指有统治资格的人，这意味着统治者应该是“最出类拔萃者”——《王制》卷六著名的航船喻（488a 以下）说的就是，谁在德性上最出类拔萃，谁才有资格成为城邦这艘航船的掌舵人。苏格拉底在那里说，“最出类拔萃者”在民主城邦中的处境往往十分艰难，因为，水手们（多数人）总想要代替“最出类拔萃者”当船长掌握城邦航船。如果听从谁的意见意味着服从谁的领导，那么，苏格拉底在这里提出的听从“多数人〔众人〕的意见”还是听从“最出类拔萃者的意见”的对立，实际上暗含着政体观念的对立：多数人施行统治是民主政体，少数“出类拔萃之人”

1 对《克力同》的细致绎读，参见维斯：《不满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克力同〉疏证》，罗晓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